

* 學術會議 *

「中國文哲研究的展望」

國際學術討論會紀要

林宗毅*

本所於民國八十年五月三十、三十一日，假本院學術活動中心二樓第二會議室舉辦「中國文哲研究的展望」國際學術討論會。然因參與學者過於踴躍，而座位有限、空間不足，臨時移往第一會議室進行。應邀提交大會發表的論文，共計十二篇，撰述者除松浦友久、樽本照雄、李福清、陳慶浩等四位先生因故未到，由大會代為宣讀外，其餘皆列席參與討論。

本次會議，係「中國文哲研究的展望」之進行的第二階段。首階段已於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舉行，為國內性的「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亦宣讀十二篇論文，內容較偏重於思想方面；此次則為小型國際性會議，討論重點較偏於文學方面。兩次共有論文二十四篇，本所希望主講者能根據與會學者的意見，對論文加以補充或修正，之後，本所再請專家學者評審，挑選優秀而足供學界觀摩的論文，予以專集刊行，並藉此檢討過去，以策勵未來。

* 林宗毅先生，本所臨時助理。

五月三十日

第一場

**“The End of T'ang Poetry Studies? — Stephen Owen's
Historicism and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 the 1990's”**

倪豪士先生（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本文認為近年來許多美國學者對唐代文學作了極有價值的研究，尤其是哈佛大學的宇文教授更是個中翹楚。宇文教授獨自完成了他對唐代詩歌的研究，其成果體現在論唐詩的系列專著中，第一部專著《孟郊與韓愈的詩》（1975），是他的博士論文；兩年後，他又出版了《初唐詩歌》，1981年又出版《中國詩歌之鼎盛：盛唐詩歌》，堪稱力作，雖尚未論及晚唐詩歌，但已構成他對整個唐詩研究的體系。

之後，宇文便從史的研究轉向純理論的研究。作為對劉若愚《中國詩歌藝術》一書的反饋，1985年宇文發表了《傳統的中國詩歌和詩學，對世界的演繹》。在此書中，宇文以其獨到的對藝術和詩歌的領悟，在時間跨度和方法論兩方面都作了縱深的拓展，但其中對唐代文學的研究興趣依然留存。1986年，他的又一部著作《紀念：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體驗》出版，這部書，不僅是對中國詩人的紀念，也是宇文對自己歷年著述的一個反思，它標誌著宇文理論觀的轉折，已從以往注重文學史的研究轉變為對這種研究的可行性質疑。

宇文自己業已闡明了這種態度，使人意識到西方學者所作的任何對唐代文學的闡釋，都不可能與其個人對文學的主觀理解截然分離。他的最新近作《迷樓：詩與欲之惑》（1990），是一部對（中西）詩歌之主題研究的專論，花了近半的篇幅討論中國的詩歌。雖然他已不會再寫唐詩研究的第四部專書，但並非意味著已放棄了對唐詩的興趣。與其說是放棄，毋寧說只是已經意識到文學研究的相對性，他認為作為一個植根於自己傳統文化的人文學者，對於唐代或其他中國詩歌的閱讀和闡釋，不僅取決於作品本身的歷史性，同時也取決於個人的文化背景。因此，若說宇文對唐詩的研究已告結束，仍言之過早。或許他擔憂的只是過分強調作品歷史來源的傾向。他曾抱怨臺灣故宮某件名為「敗興的說明」的陳列品，竟被刻板地標寫著

「天然玉石，清代」，其實，即使是未經雕琢的天然物，一旦構成一個整體的一部分或一部作品，也就具有了雋永的意蘊。在《迷樓》中，宇文正是如此嘗試地去闡釋詩歌。儘管或不能再見他唐詩研究系列的最末一卷，仍可繼續聽到他為我們誦讀唐詩時，雄辯而振聾發聵的聲音。

講 評

林文月先生（臺灣大學中文系）

1.“Remembrances”一書譯成《緬懷》可能比較文雅，事實上我也看過一篇書評把它譯成《緬懷》。

2.倪教授認為《緬懷》這本書是宇文的“landmark book”，在這本書中宇文已脫去他在耶魯大學的寫作方法，不再像從前那麼有系統地介紹唐詩。在《緬懷》一書中，宇文運用了豐富的歷史資料與聯想力，絮絮叨叨地去解釋詩，不禁令人懷疑詩的作者到底是誰，套用第九頁倪教授的話就是“Even the author, Tu Fu, is see only through Owen’s eyes.”確實，宇文表現得太熱心、太仔細，這可能與他在哈佛教書所抱持的態度有關，為介紹給西方學生知道，而盡可能將資料和聯想力發揮到極點。

3.倪教授認為“He is not only our translator, but also our interpreter.”這話我有些意見，因為任何一個有翻譯經驗的人都知道，要翻譯前，一定要做解釋，只不過是宇文做解釋做得有點超過譯者的本分罷了。宇文如此縱橫談論、解釋，也預示了宇文往後治學態度的發展方向。

4.宇文十分強調詩的藝術性，此一觀點後來就出現在《迷樓》一書中，他對詩的看法就像是隋煬帝晚年蓋的迷樓一樣，覺得它是讓人迷惑的，可是又令人相當享受於這種如何走出迷途的樂趣。所以這本書認為一首時空遙遠的詩，必須藉由我們給它的解釋才會變成一件真實而且有趣的藝術作品，可以說是《緬懷》的進一步推展。他之所以會如此做，我個人覺得這可能跟宇文的嗜好廣濶和他的才華有關，同時近年來他在哈佛大學教中國詩、法國詩、比較文學，在對學生講解時一定是會朝這個方向去做。至於晚唐詩的研究著作，我想他大概是不會接著寫了。

呂正惠先生（清華大學中語系）

宇文的《孟郊與韓愈的詩》、《初唐詩歌》、《盛唐詩歌》都是以文學史的角度來研究唐詩，可是到了《回憶》、《迷樓》這兩本書，他的研究方法改變了，倪教授認為後者較接近西方現代文學理論的讀者反應理論，對於倪教授的批評，我有兩點意見：

1.倪教授認為宇文在對杜甫〈江南逢李龜年〉這首詩做詮釋時，漏釋了兩個典故，即《九家集注杜詩》趙彥材所引沈約對王筠所說的一段話及《世說新語》的「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由此可證其分析方法已脫離了常見的歷史分析，完全是主觀的讀者反應分析方法。但個人以為宇文的分析，基本上是扣緊了該詩的寫作背景及歷史背景，即大的時代背景和杜甫個人生平的背景，我覺得他用的仍是傳統的歷史和傳記的分析方法，並不是完全主觀或個人的詮釋。至於沒有提到倪教授所提的兩個典故，是否妥當，那是見仁見智的。

2.從《回憶》一書序文中，我們可以知道宇文只是不想再寫一部很有系統性的文學史著作，他只是想按個人興趣去重組這些東西，並不表示在詮釋時就不再重視文學作品的歷史性。顯然倪教授對宇文有點誤解。

〈唐詩文藝學敘說〉

松浦友久先生（日本早稻田大學）

本文從比較法的立場，倡議研究唐詩的新方法。即以客觀手法，考察作品本身，論其文藝性。

考察作品，有必要把握作者、題材、形式三要素，並分析其相互關係。

所謂題材，指從素材到主題的全部內容。就題材研究而論，李白和杜甫的詩作有相當明顯的差異。就詩作的形式而言，李白擅長絕句，杜甫善於律詩。就詩作的素材而言，李白作品多詠別離，杜甫則非如此，由此即可得出絕句適於處理別離一類素材的結論。

擴而言之，研究唐詩，更可有下列三大觀點：(一)作者及其認識的基調；(二)題材及其意象結構；(三)形式及其表現功能。

上揭諸法中，尤以第三種為研究唐詩的佳策，其中如律詩與絕句的對比；四、五、七言詩節奏上的差異，皆是重點。

律詩因中間嵌有對句，形式上整齊均衡，予人完結自足的效果；絕句則為對

比。再者，四言詩節奏穩定；五言詩以三拍子為基本結構，但變化多端；七言詩則兼具四拍子的穩定性和後三字多樣性的節奏美。總之，偶數拍和奇數拍之間的互補、句末有休止等，皆是決定中國古典詩作節奏表現的要素。

講 評

張雙英先生（政治大學中文系）

1.基本上，個人認為這是一篇作者談自己對唐詩研究方法的文章，因此並不能涵蓋日本學者對唐詩研究的風貌。作者非常得意他所提出的「文藝學」三個字，因為它跟現代很流行的如「現象學」、「詮釋學」、「符號學」等學說不太一樣，它是從純文學的眼光來看。他這篇是他個人研究唐詩方法的一種說明，繼承了日本學者在研究時非常細膩的一面，但也繼承了機械性的特色，因此每一點提出來時，他都認為是創見，我卻都認為是泛泛之論。

2.這篇文章中較有特色的是音律部分，他經由分析，試圖確認律詩、絕句、四言、五言、七言等等詩體適合選擇何種題材表現，如抒情性或說理性等，我個人強烈覺得這些都只是泛泛之論，誰能說古詩，尤其是五言古詩適合表現說理的或抒情的？所有的五言古詩都如此嗎？這完全忽略了作品的個別性，在方法上是有很大問題的。

3.如果他個人認為自己研究唐詩的方法是很新穎的話，可見他的閱讀並不廣，至少在閱讀中國的論文方面，範圍並不是很廣，英文方面也應該很有限。這篇文章雖有創意，可惜流於空泛，究其原因，乃是作者認為只要是一個「體」就有共同的特色，事實上，詩是非常多面性的，也就是說，他以機械的方式來談論中國非常多樣性的唐詩風貌，這可能會遭遇到很大的困難。

洪順隆先生（文化大學中文系）

1.松浦先生的文章很有創見，但理論上有它的局限性，如題材方面用的例子只有幾種，其他題材並沒有統計過，如此就不夠周密。

2.引例不當，如將李白的〈清平調〉當成閨怨詩處理，宜考慮改用〈長門怨〉。

3.松浦先生的確有他獨到的見解，如聲韻上「休音」說法的提出，這是別人從未說過的，怎麼能說是泛泛之談。

第二場

〈日本における清末小説研究〉

樽本照雄先生（日本大阪經濟大學）

本文旨在介紹1901至1990年計九十年間，日本研究清末小説之概況，每十年作一斷代。前言總論九十年間研究狀況，有越來越盛的趨勢，論文發表數量，隨年代而激增。總論之後，作斷代分論。1900年代，時恰為清末，日本尚未出現清末文學的研究文獻。最早的研究文獻出現於1910年代，為長雨尾山之〈現代支那の作家生活〉，發表於1918年4月《日支時論》4—3。1920年代，有神田喜一郎和橘樸二氏，分別針對曾樸與李伯元進行研究，但重點不在文學方面的探討。真正對清末小説進行研究，始於1930年代，松井秀吉、大高巖、池田孝等，發表了有關《老殘遊記》、《九命奇冤》及蘇曼殊等之研究文章。《中國文學月報》上有多篇論文刊登，為本期主要研究園地。本期重要成果，為意識到清末乃一小説專門雜誌之時代。1940年代，《中國文學月報》改名《中國文學》，續有研究論文發表。此期重要研究者有澤田瑞穗、中村忠行。《老殘遊記》、《孽海花》之日譯本，亦於此時出現。1950年代，中村氏的研究持續進行；竹內好等人並創刊一新的研究雜誌——《北斗》。中野美代子亦為此期研究者。1960年代，《清末文學言語研究會會報》創刊，為首度冠以「清末」一詞之研究雜誌。《中國語と中國文化》亦收有清末部分。增田涉收集清末小説極為有名，亦發表一系列研究論文，其他研究者有內田道夫、三寶政美、細谷草子等。太田辰夫珍藏之《海天鴻雪記》亦在本期出版。1970年代可謂為研究雜誌創刊之年代，《野草》、《啞啞》、《清末小説研究》等分別創刊，研究者亦增多，計有澤田《野草》2號為清末小説特集，乃日本研究雜誌中，最早以特集方式出版清末小説研究論文者。《清末小説研究》之創刊，象徵新的研究局面，它是舉世最早且持續最久的清末小説專門研究雜誌，至1990年已發行至13號，主編者為樽本照雄。蘇曼殊著《斷鴻零雁記》與阿英著《晚清小説史》之日譯本亦於此期間世。1980年代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即《繡像小説》編者問題之爭論，打筆仗的舞臺由中共的《光明日報》至《出版史料》，至日本的《中國文藝研究會會報》，中、日學者共同參與。由於清末小説研究的資料增加迅速，《清

末小說》(原《清末小說研究》)年刊繼續發行以外,復創季刊《清末小説から》。清末小說研究會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錄》出版,收有大約一萬種小説版本目錄,另樽本照雄著《清末小説閒談》為日本最早研究清末小説之專著,亦問世,皆可謂研究界之盛事。今後,由於資料逐漸完備,屬於日本本色的清末小説研究即將開始。

講 評

魏仲佑先生(東海大學中文系)

優點:

- 1.資料相當豐富。
- 2.對清末小説研究,在日本九十年來的發展、變遷之脈絡交代得很清楚。

意見:

- 1.有點漫談的性質,如用嚴格的學術眼光來看,就會覺得有些鬆散。而且他提出了很多事實,卻沒有分析、推演、歸納。
- 2.抒情味道的话出現很多次,因此會有兩個缺點出現,即(一)觀念的表達沒有那麼緊湊、嚴密;(二)完全按時間順序下來的組織方式,是否適合一篇學術論文的組織方式,值得商榷。
- 3.日本人何以如此熱衷清末小説的研究,樽本照雄並沒有加以分析。另外,中、日兩國之間在研究態度、方法、特色上有何不同,似乎也可以談一談。

黃錦珠先生(文哲所)

- 1.魏仲佑教授有一篇論文〈清末小説之研究在日本〉,發表在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的《漢學論文集・第三集・晚清小説討論會專號》,討論日本的清末小説研究何以會如此興盛,正好補本文之不足。
- 2.文中提到日本學者的研究方向和特色,有的似乎流於模糊,如中野美代子、增田涉等人或《中國文學月報》、《啞啞》、《野草》等雜誌,都有這個毛病。另外,本文雖然總述了九十年來的研究概況,但歸納起來,這九十年間的研究趨勢和變化,究竟偏重那些課題,有什麼特色,文中並未談及。如能像大陸出版的《晚清小説研究概況》中〈日本的晚清小説研究概況〉一節一樣,提綱挈領地指出某些年代、某些學者曾偏重在那些課題或領域,這樣可以使我們得到一個較有系統的了

解。

3.至於研究成果，本文也提到了，如談到三十年代日本學者已經意識到清末民初乃小說專業雜誌的時代，且提出「清末」這樣一個時代概念，並打算成立清末文學研究會，這就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成果。再者，日本學者很注重資料的蒐集，如《清末民初小說目錄》的出版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研究成果。而且他們也很注重考據，運用考據的方式研究某些文學作品或文學現象，得出的結論往往和中國學者大異其趣，使我們對清末作家和文學界的某些現象、活動狀況有更具體的認識。諸如此類的研究成果都是值得一提的。

〈中國近代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蔣英豪先生（香港中文大學）

首先，作者界定「近代詩研究」是指以1840到1919年間從事創作的詩人及他們的作品為對象的研究。其檢討海內外過去數十年近代詩的研究成果時，以出版之專書專著為主，學位論文及單篇論文為輔，共分五方面檢討：

1.研究工具與研究資料：做得最多的工作要算是年譜的編纂，然而這些年譜大部分是針對譜主的政治與學術地位而作，往往忽略其詩人身分。將來實宜從文學角度編纂年譜。而目前最急需之工具書，乃「詩人傳略」及有關詩人傳記資料的檢索，還有過去幾十年海內外有關研究著作、完整書目及論文索引。至於近代詩人詩集的彙集，因數量過於龐大，短期內恐難成事，唯待將來光碟唯讀記憶體形式或更先進的科技處理。另外，近代重要詩人詩集的一字索引未見出現，也是一項遺憾。

2.近代文學史中詩史的論述：照顧周全、不偏不頗、脈絡清晰、深具史識的中國近代詩史，還未曾出現。

3.近代詩之注釋：是近代詩研究中較熱門的範圍，然選注佔了絕大多數，且選注本又常受選注者特殊立場之左右，在取樣的代表性及全面性上顯得不夠。

4.專家研究：最受研究者關注的是龔自珍、黃遵憲。其次是蘇曼殊、王國維、秋瑾、康有為、林紓等，頗見不足。

5.專題研究：約有三種：(一)派別研究；(二)歷史事件；(三)其他專題：如近代詩與新詩的關係、近代詩與佛學、近代詩與政治等。

作者從各方面檢討後認為，作為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個光采奪目的總結之近代

詩，在近幾十年來顯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實應努力推廣其研究風氣。

講 評

龔鵬程先生（淡江大學中文系）

1.使用「晚清文學」不能涵括辛亥革命以後到五四運動這一段，然而使用「近代文學」是不是在領域上就更為清楚呢？也不見得。因為古代、中世紀、近代、現代的區分，向來是和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歷史的區分有完全相對等的歷史內容，因此在使用「近代文學」這個概念時，是不是能完全避免、抹掉思想上的條件，值得討論。同時，文學發展的歷程能不能與社會的分期配合得那麼好，也是值得研究的。又，1919年以後，有很多詩人仍繼續在活動，那又如何處理？

2.蔣先生常使用舉例的方法，如第二頁列舉了已經編有年譜的詩人幾十個，但在這些名單中，有些人卻未必是以詩名，如俞樾、吳大澂、王懿榮、曾紀澤、汪康年。傳統的中國文人大體上都能做些詩，而這些人又是在如何的條件下列入近代詩人的範圍呢？又，第五頁列舉了很多值得去研究的詩人，可是我覺得還是有很多人沒有被列入，蔣先生沒有說明特別列舉這些人的原因，這可能會引起讀者的疑惑。

3.舉例中常有漏列，如第八頁的「近代詩話通檢」就不夠完整，如《雪橋詩話》、《兼于閣詩話》等等就沒有列入。第十二頁詩人箋注部分，蔣先生說全面箋注的只有錢仲聯的《人境廬詩草箋注》等幾部，這裏可能漏了沈曾植，因為早先時錢仲聯已經做有四卷本的選注本，據他告訴我，現在全注本也做好了，像這一類在選注本中也沒有列。

4.本文最可以發展的是，近代詩史論述的批評與演申，因為近代詩史的論述遠比古代任何一個時期的詩史論述都更複雜。如果能從文人階層的分化做起，也就是從清末整個文人階層的分化而形成了各種意識形態的內容與態度所顯現出來的各種不同面向來做進一步的分析，效果可能會更好。

林明德先生（輔仁大學中文系）

優點：

1.網羅資訊，概括中外，是長期追蹤與用心經營的結果。

2. 分門別類，結構清晰，對晚清詩歌研究之動向，熱忱之中有期許。
3. 資料判斷，頗見功夫；親自投入，感同身受。讀來令人有份親切感。

意見：

1. 「晚清」與「近代」的意義之認定，似乎不夠周延。倘若依蔣文的看法，採用「近代」，年限自1840—1919，那麼1918年1月，胡適、沈尹默、劉半農三人在《新青年》雜誌發表了九首新詩，以及當時的傳統詩作，這事實要如何解釋？
2. 晚清詩歌，或曰「新詩」，包括：新意境、新語句與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見梁啟超《飲冰室詩話》），據此檢視蔣文所謂的近代詩的特點：（一）對傳統詩歌的迴應；（二）對社會現實的處理；（三）對新文學的啓示（可從梁氏所謂「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去推敲。）
3. 研究工具與研究資料，應該加以定義與分類，以避免混淆的現象發生，例如：倉田貞美《中國近代詩の研究》既見於工具書，又見於專題研究——派別研究。
4. 近代文學史中詩史的論述，應補入游國恩等的《新編中國文學史》，因為其中第九篇：近代文學，論述頗為詳備。除此之外，是否也應該考慮臺灣日據時代前後的詩社詩人？
5. 晚清詩歌與政治，應可從歷史動向中的三個主軸：「自強」、「維新」、「革命」去歸納。
6. 建議思考的問題：（一）晚清詩歌的主流在那裏？（詩歌生態分布）；（二）晚清詩歌的歷史定位？（文學發展史上的客觀事實）

答 辯

1. 「晚清」、「近代」，選那一個都沒辦法十全十美。我選了後者，加以解釋，暫時來說可能是比較好的一個辦法。至於分期，確實還有討論的餘地。
2. 「近代詩話通檢」，主要是以我手頭上覺得方便使用的來做，有些詩話我一直沒找到，也有一些與晚清的關係可能不大，所以我就沒列入。

五月三十一日

第三場

〈怎樣閱讀中國敘事文——從《左傳》文藝欣賞談起〉

王靖宇先生（美國史丹福大學）

作者綜觀前人談《左傳》文藝欣賞，發覺有一個大特色，即他們絕大多數是把《左傳》當作「文章」來看待，而不是敘事文。他們談《左傳》中的練字造句和總體結構，對於書中的敘事過程或輕描淡寫地帶過。

作者深覺從文章的角度看《左傳》，只能了解它文學成就上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能同時捕捉事件演變的過程，才能真正欣賞敘事文的藝術魅力。

作者並指出敘事文的結構中有兩個必不可少的因素：(一)被敘述的事件必須具有先後順序；(二)一系列的事件之間必須具有連貫性。

本文並實際從《左傳》中舉出《鄭伯克段於鄆》，說明兩種不同的欣賞方式——即(一)置身於敘事流中，並積極參與故事的編織，就好像變成了第二個作者；(二)只強調文字與結構。前者給人的感覺是流動的；後者則給人靜止的感覺。

最後，作者覺得西方文學批評方法可以作為「他山之石」，使我們的視野擴大，對自己的文學傳統開始反思，從而產生新的看法和新的理解。

講 評

李 鑒先生（師範大學國文系）

1. 假如純粹是以讀史的態度來看待《左傳》，我非常贊同王教授的見解；但如果是以讀文的態度來看，恐怕還得注意其修辭和結構，因為如果只是讀史，他只要把史料依先後順序連貫地排列紀錄即可，那麼《左傳》也只能算是實錄而不能算是敘事文。

2. 王教授認為閱讀敘事文時，結構不是最重要的，不知王教授對「結構」下的定義為何？敘事文的連貫性、先後順序算不算是「結構」呢？

3. 我不知道王教授何以要選擇《左傳》作為閱讀敘事文的討論對象？我想應該是基於對《左傳》的文學價值，才把它當成敘事文來讀，如果不從文學技巧去討論，而僅僅是從敘事的觀點去討論，那是讀史，而不是讀文。

4. 以欣賞圖畫和音樂來比喻兩種不同的欣賞態度，我覺得並不恰當，因為敘事和敘事文是不可分的一體兩面。

5. 談《左傳》敘事過程的文章，在清代已有人提到，但並不是完全跳開文章技巧、結構來談的。

張高評先生（成功大學中文系）

1. 本文特別強調閱讀過程，太注重讀者的閱讀地位，似乎流於主觀和武斷。《左傳》畢竟是一部史書，不同於文學作品的創作，它不能違反歷史真象，所以文字的填補或想像之空間有限。那麼讀者反應批評理論就不太適合運用在歷史性的散文分析方面。

2. 如果要對《左傳》的敘事文作正本清源的研究，恐怕要先談《左傳》的經學意義或史學意義，然後再談及它的文學意義，如此較能釐清《左傳》的敘事源流正變。

3. 本文重點放在敘事過程中，但什麼叫「敘事過程」？是不是就是「連貫性」、「先後順序」、「直線發展」？這些關鍵詞都沒有做說明，容易產生誤會。我的理解是這三者其實就是敘事結構，它與經學、史學所謂的「屬辭比事」，文學的「剪裁布局」等方法應該沒有什麼兩樣。另外，作者的意義應來自兩方面：一個是作品本身；一個是讀者所賦予的意義，如果能合起來看就更好。

4. 本文一直強調「文章」與「敘事文」不太一樣，這裏的「文章」恐非一般所謂的「文章」——凡一切以文字記載的文字作品，如果是這樣，「文章」與「敘事文」就不能當成對等的觀念來探討。

5. 《左傳》擅長敘事，寫得最好的是戰爭，所以舉例宜舉五大戰爭，不然，至少要多舉一些例子。

6. 如果要發展本土化的文學批評，「評點學」是一個研究方向。

單德興先生（歐美研究所）

1. 個人認為王教授的論文是他從1970年代開始的中國敘事系列研究的一部分，

如1972年的專書《金聖嘆》(Chin Sheng-t'an)、1978年的〈脂硯齋評和《紅樓夢》：一個文學的研究〉(“The Chih-yen-chai Commentary an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Literary Study”)，以及其他有關《左傳》和中國傳統小說的研究，多運用西洋的文學理論及觀念來探討中國傳統敘事文學及批評(包括長久以來被忽視、貶低的評點)，對於中國敘事的闡揚和西方學者的啓迪，貢獻良多。

2.就「文史之分」的問題，我想這可能不是這篇論文所要探討的重點。其次，伊哲的理論以現象學為基本架構，著重閱讀過程的美學反應。雖說主要探討的是文學文本，尤其是西洋小說，但應可擴及其他類型之作品或藝術品。亦即這篇論文就研究方法的選擇而言，不致有太大的問題。至於實際運用的結果，則有待進一步的檢視。又，若從敘事學或後設歷史的角度來看，文學與歷史本質上的差異，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大。

3.早年王教授曾以新批評的方法及理念來研究中國敘事，本文則以伊哲的美學反應理論討論《左傳》。新批評強調作品的自主性，不理會作者、讀者或時代背景，而美學反應理論則重視讀者對於文本的領受，二者的基本假設衝突。請問您在研究方法上為何有此轉變？其轉變的意義何在？

4.關於運用西洋理論來討論中國文學的問題，個人認為這是中外比較文學中很重要的一項課題，我曾運用伊哲的美學反應理論來討論中國傳統小說的評點，認為他強調閱讀過程的時間性、不定性、互主性、文本與讀者的互動，可提供不少借鏡之處。誠如王教授在《《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的序文中指出：「如何提高西方文學家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從而使中國文學成為建立文學理論時所不可或缺的一環，是一項艱巨而意義深遠的工作。」因此，如何促使兩個不同的文學傳統「彼此映照」，應當也是此次中國文哲研究的展望國際學術討論會的目標之一。

答 辯

1.七〇年代初期，我其實不是對新批評特別有興趣，我只是看到金聖嘆有些看法與新批評派接近，所以我才提到他們。

2.文中我之所以特別強調讀者的心理反應，是因為覺得以前的人談《左傳》，比較強調形式，所以想換個角度補充一下，這絕非閱讀敘事文的唯一方法。其實兩者都應注意，我想沒有衝突的，而且也不是非常大的轉變，更何況一個人心路歷程

的改變也是常見的。

3. 評點學值得研究，這點我完全同意，本文之所以批評到它，乃是指它機械化及其勉強之處，而不是想貶低它。

4. 至於為何選《左傳》而不選故事性更強的？這之間——歷史與故事——的關係非常複雜，我個人覺得二者的分別，應該不是種類的分別，而是程度上的分別。因為歷史在很多時候，會參雜個人色彩的詮釋，也就是會加入一些猜測，略帶編故事的味道，因此歷史與故事的分界可能不是那麼清楚。

〈易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黃沛榮先生（臺灣大學中文系）

本文從學術研究及發展的觀點，說明當前《易》學研究上之困境與前景，並以之作爲全面發展經學的參考。文分數端：

1. 《易》學研究的最新情況：分十小節介紹近年來研究最新趨勢(一)在書目、提要方面；(二)在論文目錄方面；(三)在論文集的編印方面；(四)在《易》學史的撰述方面；(五)在零星《易》說之輯錄方面；(六)在整理《周易》經傳，並作注釋方面；(七)在《易學辭典》的編撰方面；(八)在《周易》研究小組之成立方面；(九)在有關以科際整合方式對《周易》進行研究方面；(十)臚列近五年來大陸出版之《易》學專著。

2. 當前《易》學研究的困境：(一)研究人力之不繼；(二)研究環境之欠佳；如①研究資料不易取得；②整理文獻不受重視；③研究方向之偏差。

3. 振興《易》學的幾個方向：(一)古今論著的整理；(二)研究角度的更新；(三)科際人力的結合：①大型計畫；②研究小組；③學會組織；④科際合作。(四)研究心得的交流：①學術會議；②出版著作。(五)現代意義的融合；(六)《易》學疑難的釐清：①《十翼》成書的問題；②筮法的問題；③《易》學與其他學科的分際問題；(七)後繼人才的培養；(八)《易》學觀念的推廣。

末尾並附錄發表於《漢學研究》第七卷第二期（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的〈近十餘年來海峽兩岸《易》學研究的比較〉一文。

講 評

高懷民先生（政治大學中文系）

本文較偏重作品、文獻資料的整理，而《易》學哲學史方面則談得較少，在這裏我有兩點感想：

1.《易》學與中華民族文化同悠久，回顧一下，歷史上凡是學術思想展開的時候，《易經》都是最先出現的。民國成立後，照理說應該是《易經》又要率先抬頭的時候，但因為西方哲學的衝擊，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哲學暫避一旁，大家都努力地學習西方。現在我們對西方哲學有所了解，於是最近二十年《易》學又要開始發揚了。各大學哲學系、文學系幾乎都開《易經》課，二十年前則不一定。可以預期一個大的思想時代就要到來了，故本文相當有它的時代價值。

2.《易經》在各時代常能保持其本質不變，而又融合各時代的思想特色，以新的面貌出現。今天是科學昌明的時代，相信今後《易》學的發展一定可以融合當代科學的研究而呈現新風貌。

林慶彰先生（文哲所）

優點：

- 1.資訊的掌握正確而迅速。
- 2.《易》學研究十大目標都確實可行。
- 3.所提《易》學研究的困境，觀點也非常正確。

意見：

1.第二節《易》學研究的最新情況，以前言所提具有前瞻性的十大目標來規範，似乎不妥，因為十大目標有的未實現，而最新狀況是既有成果，如此一來，就會有問題產生。

2.第二節《易》學研究的最新狀況與第三頁、第四頁所提到的大陸《易》學專著多有重複，如能避免則更好。

3.海峽兩岸重要的《易》學研究著作，近五年來臺灣方面只提到五種，實際上不只如此，如師大戴璉璋教授的《易傳的形成及其思想》及一、二十種的博、碩士論文和一些期刊論文都沒有列入；至於大陸方面也有遺漏，大概三、四種左右。

4.第六頁黃教授舉了兩個編輯古今《易》學書目體例的範例，如果兩相比較，就可以看出下面那一種並沒有列出版本，兩種範例的體例並不一致，這是編書目時比較忌諱的。

5.建議：(一)本文只就外在形式檢討，至於《易》學本身，如十易的著成年代、注解、《易》學史的研究成果……等都沒有提到，似乎可以補充一下；(二)兩岸研究成果的比較，也是可行的撰述方向。以前黃教授寫過這方面的論文，不過，這一篇則沒有提及。

答 辯

1.高教授認為《易》學的研究往往會開創學術的黃金時代，本人深有同感。

2.《易》學的研究，在經學研究的領域中是最具有發展餘地的，但也因為如此，必須以研究小組來進行研究，否則單打獨鬥，會很累的。

3.感謝林教授指出本文資料漏列的部分。另外有四點，我有不同的看法，即：(一)如當前《易》學研究未超越我所列十大目標，我想沿用十大目標應不會有什麼問題；(二)資料重複的問題：第三、第四頁是把大陸近幾年來的著作列出來，以見其發展，如果只是因為前面在敘述某一方面成果時提過就不再列出，就會顯得殘缺不全，斟酌之後，我覺得小部分的重複，沒有影響；(三)體例問題：第六頁所舉的《新鐫方孟旋先生義經鴻寶》十二卷，因不見於任何史志書目著錄，又收藏於大陸及美國，我無法見到原書，故只能止於轉錄；(四)細部研究敘述不夠：如十易的著成時代，關於這點，因為涉及到未成定論的問題，不能以一己主觀判定去非議別人的看法，所以就略而不談了。

〈修辭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沈 謙先生 (空中大學)

本文分三大部分：(一)修辭學研究之鳥瞰；(二)修辭學研究之成果；(三)修辭學研究之展望。針對修辭學之研究，作一番概括性的檢討與前瞻。作者在宣讀時，指出其重點在第三部分。

在鳥瞰完整個修辭學的發展後，檢視其中的研究成果，主要顯現在四方面，

即：(一)綜合性的研究；(二)專門性的探討；(三)作品的修辭分析；(四)修辭學史的編撰。

之後，作者從三方面提出若干展望：

1.修辭學資料之整理：(一)研究整理中國古代的修辭理論，擷取傳統精華；(二)翻譯介紹西洋、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修辭學著作，以資借鏡、比較；(三)編寫修辭學論文索引、修辭學論著目錄及概要；(四)成立中國修辭學研究資料中心，將修辭學有關資料，蒐羅完備，妥善編目，分類整理，並編印書目提要、出版分類專集，以利流通。

2.修辭學之專題研究：有三方面仍須努力，即(一)單項辭格的專門探討；(二)各種辭格的比較研究；(三)篇章修辭的研究。

3.修辭學之整體綜合研究：必須著力的有三項，即(一)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並重；(二)口語修辭與文章修辭並重；(三)開拓研究的領域：作者特別強調重視古今文學名著的修辭分析，以及加強修辭學與文學批評的結合。

講 評

王熙元先生（師範大學國文系）

1.這篇論文有以下幾個特色：(一)前二部分對資料的掌握很不錯；(二)敘述上層次分明；(三)運用修辭技巧撰寫本文；(四)提出具體而且前瞻性的建議。

2.能不能補充、強調一下修辭學與美學的關係？

3.能否借助修辭的習慣，繼而結合文法學來辨別古書的先後或真偽問題？

4.開拓更多的研究領域，將來有無可能拓展博、碩士論文專門探討如李白詩的修辭、杜甫詩的修辭等，這個可能性是不是也可以探討？

林保淳先生（文哲所）

1.沈教授似乎認為，在近百年的發展中，「修辭學」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因此對「修辭學」的意義、範疇、目的等皆未作說明。事實上，誠如王德春在〈社會語言學、言語規律和修辭學對象〉一文中所說：「關於修辭學究竟研究什麼的問題，至今意見仍很分歧。」（《修辭學探索》，頁六〇），在未對「修辭學」定立明確範疇之下，沈教授所指出的歷來研究成果和未來研究路向，恐怕就較缺乏說服力。例如，在發展成果上，沈教授舉的四項，就和未來研究路向的三方面有不少重

疊，如「專門性的探討」與「修辭學之專題研究」、「作品的修辭分析」，同樣都以研究「辭格」、「篇章」為主，後者只能說是沿襲，而不能說具有前瞻性，這正是對「修辭學」未作研究對象之釐清而發生的問題。

2.以筆者淺見，認為「修辭學」的範疇至少須包括：(一)語體：指語言的體式，它們之所以能自成一格，必有其特殊語言規律，其規律何在？(二)風格：指作品文詞架構所呈現的不同特色。不同的風格是何種不同的語言結構塑造而成的？(三)語境：指不同的語言環境，它對語言結構所指涉的意義有何影響？因此，前此百年的研究是否曾針對這些問題展開過討論？其重要觀點、方法如何？成果及有待努力者為何？以一篇題為「展望」之論文，是必須加以說明的。否則，企圖將「修辭學」與文學批評結合的理想也就不夠具體。

3.總的說來，這篇論文，在個別論著的歷史成就上，都具有相當扼要的概括；但總體的成果，往往輕輕帶過，未作綜合之說明，因此所謂的「展望」就顯得比較模糊，雖然開示了研究之方向，卻未提出方法論，也未顯示出一套具有系統的理論基礎，不免美中不足。

答 辯

1.王先生提到修辭學與美學的結合，我完全同意。又，以修辭的習慣和文法學結合的方法來判斷古書的真偽和先後，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創見及展望，我會把它補入我的論文。

2.我可能犯了一個「美麗」的錯誤，以為大家對修辭學的意義和研究範疇都很清楚，誰知事實卻不然，下次我確實應該先寫一篇這一類的介紹文章。

3.我很同意林先生所提「語體」、「風格」、「語境」等問題的研究很重要，其實我的文章是有提到，只是後頭沒有特別強調而已。

第四場

〈蘇聯研究中國文學理論概況〉

李福清先生（蘇聯科學院）

俄國對中國作家文學觀的研究，是由B. 阿列克謝耶夫開始，他選擇了司空圖

的《詩品》作為研究對象。他從確定「詩品」在相類似的中國文學思想作品中的地位著手，討論司空圖作品與前人鍾嶸《詩品》的原則區別。認為司空圖說的「品」不是評價標準，而是個別詩歌的抽象名稱。他並闡明二十四品標題的涵義及司空圖詩中主語的問題，還研究了司空圖「道」的概念及莊子對司空圖的影響等。

到了六十年代，作者發表《中國戲劇理論》，探討了兩個問題：(一)用「品」的評價範疇來研究中國戲劇的問題；(二)晚明吳江派和臨川派戲曲家之間的論爭問題。又，W. 謝曼諾夫發表了〈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中國小說理論〉，提出三個論點：(一)小說的可能性、任務及接受性；(二)體裁界限，小說的種類及歷史發展；(三)小說的藝術特點。又，K. 戈雷金娜寫了一篇〈林紓的文學美學觀〉，主要探討林紓的《春覺齋論畫》和《春覺齋論文》兩部著作。戈雷金娜進一步研究整個19世紀到20世紀的中國傳統文學理論，寫成一部《19世紀至20世紀初中國文論研究》(1941年)，包括桐城派、常州詞派、劉熙載、王國維、魯迅等人的理論。

不久，李謝維奇的《古代與中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學思想》也出版了，其嘗試通過與中國古人世界觀對比來研究傳統的中國文論觀，即試圖綜合研究中國文學評論思想的原則。除了詳細研究道、德、文、氣、風及風骨等基本範疇外，還兼及純詩歌的範疇，如賦、比、興，以及中國古代文論家對詩和小說本質的理解。

最後，作者認為有幾方面尚待俄國學者研究，即劉勰、六朝、唐宋元明、章回小說理論、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等。

講 評

邱燮友先生（師範大學國文系）

1. 本文主要介紹有關當代研究中國漢學的五位學者所寫的五本書，討論到《詩品》、戲劇、小說、文學批評等方面，遺憾的是沒有提到散文方面的研究。
2. 蘇俄學者很重方法論，這是本文所體現的一個特色。不過，在戲劇方面，李福清先生提了很多問題，卻都沒有解決。
3. 當前蘇俄的漢學研究，還有一項特色就是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從事研究。如K. 戈雷金娜對林紓的研究。

黃景進先生（政治大學中文系）

1. 本文屬於報導式文章，過於簡略，不夠深入。
2. 從本文可以了解蘇俄的研究風氣並不是很熱烈，研究者非常少，範圍也不廣。不過，誠如邱教授所指出，他們有一些研究特色，如運用科學方法、比較觀點，這是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另外，他們也會從事一些較冷門的專題研究，如林紓的文學理論、呂天成與祁彪佳戲曲理論的比較。
3. 他們在研究中國文學理論時，喜歡從文類做為出發點來研究。
4. 有些觀點實在是有問題，如把司空圖的「實境」解釋成「靈機」，可能是對中國的東西還涉獵不多所致；再者，認為中國文論是受儒家影響，詩論、詞論是受佛道兩家的影響，也是有問題的。
5. K·戈雷金娜對中國文論的某些看法都滿正確的。

〈從一人獨唱談到元雜劇之特徵〉

金文京先生（日本慶應義塾大學）

作者認為元雜劇有兩大形式特徵，即「一本四折」、「一人獨唱」，而前者除了因劇情需要可加「楔子」或《西廂記》等長篇作品之存在外，似無特別問題，而後者之內涵反具較大之爭論點，甚至影響到雜劇本質的詮釋，本文即針對此一問題探討。

首先，作者歸納周貽白、徐扶明、葉慶炳三位先生認為演員隨劇中主角人物的改變而輪流登場的理由為三：（一）一個演員從頭演唱至尾，未免過累；（二）一個劇團不可能只有一個主角演員；（三）由一人改扮，應無充分的時間。作者則認為：（一）如果演員一人獨唱過於勞累而需要複數演員輪流登場，那麼現存三分之二左右的元雜劇主角只扮一人的作品又該如何演？故第一點實不成為理由；（二）據現存雜劇〈藍采和〉、南戲〈宦門子弟錯立身〉劇情反映及山西洪洞縣明應王殿元代壁畫描繪，當時劇團一般皆由一中心演員及其家族組成，規模不會很大；且觀眾看戲之興致往往在演員身上而非戲之內容，若演員以過累為由而打退堂鼓，未免掃興之至；（三）資料缺乏，上演情況不明，不敢妄為臆斷，然主角演員大半較慢出場及先退場，因此折與折之間至少比別的演員有較長時間可以改扮。又作者發現主角只扮一人物的作品

裏，同樣常因劇情之發展而需改變服裝，亦屬改扮。綜上所述，作者認為三位學者之論點皆乏說服力；至於吉川幸次郎的《元雜劇研究》則未觸及此一問題。

繼而，作者發現在正末、正旦扮演不同人物的作品裏，正末、正旦所扮之複數人物不會在舞臺上同時出場，且必要時尚犧牲情節之自然發展，此一現象唯一合理解釋即一個演員從頭到尾改扮不同人物，故即使主角人物變換的作品，演員仍是由一人改扮。

最後，作者經由採樣分析，認為：變換主唱人物，乃出於作者的故意設計，恐非能力有限所致。

講 評

曾永義先生（臺灣大學中文系）

1.我非常贊同「小劇團」的主張，元代時的劇團，演員不可能很多，馮沅君曾作過統計，每一場的演出，一般只是三至五人，這從元代壁畫及金先生所提的文獻資料皆可證明，而主角當然也只有一個正末、一個正旦，如壁畫中的橫題「大行散樂忠都秀在此作場」，就有凸顯主角的意義。其次，我也贊同金先生針對「改扮」問題，批評他的老師吉川幸次郎的見解。

2.在探討「一人獨唱」這個問題時，有幾個問題必須先弄清楚，即：

(1)演員、腳色、劇中人物三者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演員充任腳色扮飾劇中人物。因此，可以有好幾個演員充任一個腳色、扮飾同一個劇中人物；也可以一個演員充任幾個腳色、兼扮不同劇中人物；也可以由幾個演員充任一個腳色、扮飾一個劇中人物，故「一種腳色獨唱」與「一人獨唱」是不能劃上等號的。雖然元代是小型劇團，恰好一個劇團只有一個正旦、正末，「一人獨唱」等於「一種腳色獨唱」，還是得弄清這一點。

(2)中國文化有一種包袱性存在，對前代一定有所繼承，很難一下子擺脫掉。從詩贊系的說唱系統及詞曲系的說唱文學都可以了解講唱者只有一個，元雜劇的一人獨唱，事實上就是繼承了這樣的一個傳統。

(3)更關鍵的是，元雜劇並不是一本四折一口氣演完的，它在折與折之間插入了其他的歌舞、吹打、百戲，如此一來，所謂的一人獨唱太累或改扮來不及的問題就都解決了。若從根源上來看，元雜劇的一本四折，就是淵源於宋金雜劇的四段，

而這四段是各自獨立的小戲，因此我曾說宋金雜劇院本是「小戲羣」，它在每一段演出時，不是一口氣演完，而是加入說唱、吹打等，元雜劇可以說是繼承了它的體制，又進一步發展，將四段貫串成首尾完備的故事情節，但演出時仍不是一口氣演完。有兩段明代人的文獻資料可以證明，一是臧懋循改訂《臨川四夢·還魂記》的眉批及顧起元《客座贅語》中提到萬曆以前的演出情況，都是每折間參合「爨弄隊舞吹打」的。

總之，學者們如能弄清這三個前提，我想衆說紛紜的問題就可以不必再討論了。

賴橋本先生（師範大學國文系）

1. 曾先生剛剛提到一人獨唱乃是從說唱文學講唱者只有一人而來，因此，金先生如能把一人獨唱的來源交代清楚，理論根據可能就會強一些。

2. 我很贊同金先生對「一個演員從頭演唱至尾，未免過累」的反駁。

3. 事實上一個名演員是可以唱各種人物，以表現他的藝術技巧，而這也是從諸宮調等說唱文學而來，由一人說唱所有的人物。

4. 至於是否有充分時間改扮，除了曾先生所提兩條資料，我再補充一點，即大陸學者劉蔭柏的《元代雜劇史》中提到《金瓶梅》第四十三回，描寫正月十六日西門慶宴客看戲，劇目是〈王月英元夜留鞋記〉，演出時間從中午一直到「天色已晚」，花了三、四個小時，這裏面就談到除了演出正折外，折與折之間也穿插有雜耍、爨弄、吹打，所以演員應有充分時間改扮。而且，我想一個名演員應該也是以能改扮為當行才是。

林明德先生（輔仁大學中文系）

鄭騫老師在《景午叢編》中談〈元雜劇的結構〉時，也曾討論過「一人獨唱」的問題，在這兒提供給金先生參考。

答 辯

1. 這篇文章並沒有寫完，只寫了三分之二，未寫完的部分剛好與曾先生、賴先生提到的問題有關。

2. 鄭騫先生的文章我看過。

3. 我剛剛講的不贊成周、徐、葉三位先生的看法都是消極的理由，其實還有更積極的理由是公案劇裏邊的復仇劇，如〈趙氏孤兒〉，一個人演到底可以滿足觀眾復仇的心理；另外，元雜劇裏也有很多例子是，一個演員一下子演這、一下子演那，可以因此見及演員的技巧如何。以上的化形方式與宗教儀式很有關係，因為宗教儀式最重要的一個屬性就是人變成神，如現代仍然可見的日本能劇，演員往往前半是人，後半就變成神或鬼，就是所謂的化形。

第五場

〈紅樓夢在韓國的影響及研究〉

崔溶澈先生（韓國漢陽大學）

本文首先簡述《紅樓夢》在韓國的流傳情形，分兩方面談：（一）朝鮮文人對《紅樓夢》的著錄；（二）韓國所藏《紅樓夢》及續書版本概況。

其次，談《紅樓夢》在韓國的影響，主要探討《紅樓夢》對《九雲記》的影響，認為作者無名子寫作的時候，不時拿《紅樓夢》、《鏡花緣》來加以活用，而且運用得非常巧妙，因此《九雲記》不僅是韓國古典小說史上較重要的作品，也是中韓比較文學研究上不可或缺的文獻。

第三，談到《紅樓夢》在韓國的翻譯，經考察，可以看出韓國的現代譯本《紅樓夢》，在數量上相當可觀，然學術性的譯本較少，大部分忽略了翻譯底本上的版本特徵及正文中的注解。至於翻譯者也很少是紅學專家，因此對研究概況及方向的問題未加以正確的介紹，以致韓國紅學界至今尚未蓬勃發展。不過，近幾年來隨著中國學的全盤發展，情況稍有好轉。

最後，作者談到的是《紅樓夢》在韓國的介紹及研究，認為韓國的紅學資料及研究，可能僅次於日本，在海外各國當中也是較重要的，甚具發展潛力。至於現階段研究課題，作者以為以下幾方面須加以努力：（一）現存資料的整理、流通及研究；（二）更新的翻譯本；（三）較全面性的「紅學著作」；（四）組織專門性的「紅樓夢學會」。

講 評

周策縱先生（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1. 有件事很有趣，因為《樂善齋本》翻譯本是給王妃和宮女們看的，究竟《紅樓夢》中講男女之事的，是不是也全部譯成了韓文呢？

2. 本文第十頁提到「《紅樓夢》怡紅院為賈寶玉居所：《九雲記》玉香院為蘭陽公主居所。……可見《九雲記》的有關詞語直接來自《紅樓夢》，而較重要的已被修改，如玉香院、杜蘅院、夢友館等。」但事實上「怡紅院」與「玉香院」並不是那麼對稱。我猜想「玉香院」是不是可能指的是林黛玉，因為賈寶玉對她說過「玉香」、「香玉」一類的笑話。

3. 第五頁提到「而現存《東觀閣本》有後人的批注，有眉批、行間批、回末總批等，據一百二十回末總評，批者為『怡綠主人』，生平未詳。」我想這些批語是後來的韓國人加上去的，他們有些批語很有意思。

4. 作者提到現階段韓國紅學研究的課題有四方面，我想補充一點，是不是可以把《紅樓夢》用韓文改編成劇本一類的通俗文學，這樣對《紅樓夢》的推廣也許有幫助。

康來新先生（中央大學中文系）

1. 本文具有歷史性的開創價值，取材方面完全第一手，態度也非常嚴謹，不妄加臆斷。

2. 期許崔先生以後能有進階性的研究，而非仍是資料的增訂。如可把中、日、韓看成是一個東亞文化圈，探討其同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同質性和異質性。

3. 《紅樓夢》在韓國的流傳和受到喜愛的程度遠不及《水滸傳》、《三國演義》，是不是因為韓國屬北方民族，比較喜歡英雄而不喜歡兒女？或者是清朝是滿族入主中原，漢文化的正統性不夠強呢？希望能夠對材料作一些詮釋。

4. 能否多交代一些韓國譯評家的背景？

5. 本文是對臺灣學者發表，而非韓國學者，所以對一些韓國年代、王朝的背景，最好能稍加說明一下。

6. 版本製成表格，或可節省一些篇幅，而且更明晰、方便。

7.我想介紹《紅樓夢》的研究概況應可再廣些，如在大學方面是不是有《紅樓夢》的課程，這點文中沒有敘及。

答 辯

1.《東觀閣本》原來是課本，上面有一些毛筆寫的評語，我蒐集了十幾條，不太多。至於第一百二十回的總評題有「怡綠主人」，可能是將「怡紅院」的「紅」字改成「綠」字，用爲字號，他的生平未詳，不過，我猜他大概也是朝鮮人。

2.關於宮廷翻譯本的問題，據韓國某研究學者指出，係當時皇后喜歡看小說，遂命令韓國小說家多多創作，但創作有限，只好將中國小說翻成韓文。

3.周教授提到可將《紅樓夢》改編成戲劇，以利推廣，但在韓國沒有人聽得懂、看得懂京劇。但我想改編成兒童讀本，倒是可行的。

4.至於翻譯者、朝代背景的注解及版本表格，這的確是我要補充、改進的地方。

5.目前韓國還沒有開《紅樓夢》的專書討論課，不過，「小說」課程中會提到。

彭小妍先生 (文哲所)

這篇報告，主要是以沈從文的《阿麗思中國遊記》爲例，凸顯出傳統五四「寫實」批評模式，在面對這樣一部兼具寫實和虛幻的作品時，所遭遇的困境。

筆者用仿諷 (parody) 的觀念分析這部小說，發現沈氏對小說作爲一種文類 (genre) 引發的諸多問題，念茲在茲。他特別注意到小說的文體 (form) 和內涵 (content) 之間的關係。沈氏小說裏幾乎運用了童話的所有成規 (conventions)：如天真的小女孩、會說話的動物、幫助人的神仙等等；但其內涵，卻是抨擊社會現狀：如老大中國的腐敗弊端、常年革命所帶來的反效果、中國人的崇洋媚外風氣、失業貧窮等經濟問題等等。《阿麗思》的童話形式和社會批評的內涵格格不入，等於凸顯出這部書歸類的問題；讀者的反應如何，讀者是否能接受這樣的處理方式，都是沈從文在《阿麗思》的〈後序〉中相當關心的問題。

最能透露沈氏的作家「自覺性」的，是《阿麗思》中對各種傳統文類的仿諷，例如旅遊指南、流浪漢小說（the picaresque novel）、五四模仿西方的浪漫詩派，還有當時流行的私小說（I-Novel）等等。他的仿諷不僅是對這些文類作了一個總檢討，也是刺激讀者反省自己的閱讀習慣，等於給讀者一個再教育。進一步而言，沈氏對這一類問題的關心，正反映出五四作家對文學創作活動的高度自覺性。五四一代「文學為人生」或是「藝術至上」的爭議、對古典文學的全面檢討、對西方各種文學傳統的蓄意模仿，以及對文學救國救民使命的深自期許，在在都流露出對文學形式、內涵、創作過程和讀者反應的關懷，以及摸索創作新方向的努力。五四一代作家的自覺性（self-consciousness）特質，是五四文學研究值得開拓的新領域。

仿諷或者其他類似的觀點，其實可以運用來研究五四的許多所謂「寫實」的作品。例如魯迅的《阿Q正傳》可用 *berlesque* 的觀點來分析，老舍的《離婚》可用 *parody of romanticism* 的角度來研究。五四作家事實上在小說創作方面不斷找尋模仿或仿諷的對象、不斷作形式風格上的實驗。如果我們能正視這一點，今天五四小說批評應該能突破「寫實」、「浪漫」的瓶頸。

講 評

馬 森先生（成功大學中文系）

1. 本文中關鍵詞的用法不是很統一，如第二頁的「文體」注的是 *genre*，這個字在西方的文學批評中不管是法國或英美，都指的是「文類」。且在本文第三十一頁又出現有「次文類」，注的是 *subgenre*，可見 *genre* 指的仍是「文類」。可是到了結論中，彭教授可能對「文體」和「文類」又有了不同的看法，如第三十三頁「小說作為一個文類，……是否在文體上也展現出類似的駁雜多樣呢？」顯然「文體」不是指 *genre*，另有涵義。第三十四頁也有同樣問題，「至於文體上是否寫實，則有待商榷。」「文體」指的不是 *genre*，而是 *style*。

2. 論文題目有些語病，不夠清楚。因為「童話」和「寫實」兩個詞應該是屬於不同的範疇，前者屬於文類或者是次文類，後者則指的是哲學的觀點、文學的風格或十九世紀西方後期的文學流派，不是一個文類，兩者不能對舉，我個人以為至少應加上「小說」兩個字，成為童話或寫實小說。

3. 本文副題目是「兼論五四小說形式的流變」，但文中卻未論及「流變」的問

題，而只是談到一些作家小說的形式。所謂「流變」應該是指從某一種形式變成另一種形式。如果沒有談到，副題目就應改為「兼論五四小說的形式」，否則必須再加添很多資料說明。

4. 結論部分提到「歷來評家認為，梁氏的小說理論有主導小說走向寫實路線的趨勢，與日後五四小說的寫實風息息相關。」所謂「歷來評家」宜加以注明。

5. 影響五四小說走向寫實風的，我想應該是中國的國情所致，因為中國的國情要改良社會、批評傳統，寫實可能是比較有效的方式，所以才採用。事實上，也正因為他們有救國的熱誠，要批評傳統、改造社會，相對地也就非常不客觀，反倒是理想、浪漫的成分比較多。

黃碧端先生（中山大學外文系）

1. 沈從文的作品能否稱得上「原創」或「前衛」？因為前衛是對原有的東西有所反動，在這點上，沈從文可能並沒有達到所謂激烈、推翻固有形式、逆流而行的特質，所以不能稱為「前衛」。即使以沈從文的全部作品來看，在當時，他是被歸為保守、守舊的，他自己也曾風趣地辯解；他似乎也寧願做一個保守的人，因為莊子在他那個時代也被目為保守的人，今天讀〈馬蹄〉、〈秋水〉，彷彿眼前還站著這麼一個保守的人。因此在創作的姿態上，他是寧取保守不採前衛的。而他之所以創作出與當時大多數寫實或浪漫作品都不同的作品，最大的動力可能是西方許多不同的作品在他的閱讀過程給予了不少的啟發，使他產生了一種不能自禁的模擬和整合，乃至於相當不同的作品。

2. 「文類」與內涵之間是不是有對立的必然性？「童話」和「寫實」是不是對立？值得商榷。事實上，「文類」可以包含任何一種可能的內涵，因此屬於文類或形式部分與它的內容是什麼有關，而這之間不一定衝突。

答 辯

1. 馬教授認為結論部分（頁三十）提到的「歷來評家認為，……。」的一段話要加注解，我之所以沒加，乃是以為這已是約定俗成的一個觀念，因此沒有注意。

2. 很謝謝馬教授指正我「文類」、「文體」的混淆使用。其實，我這樣用，只是想求變化，因為寫中文老用同一個詞，總覺有重複的感覺，所以雖然用「文體」，

指的仍是 genre。至於爲何會想到用「文體」代「文類」，主要是受到梁啓超〈新中國未來記〉的影響，他說：「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說的「文體」也就是 genre。

3.我這文章題目中的「寫實」，指的就是「寫實作品」的意思。之所以省略「作品」二字，是因爲覺得中文上不太對稱。不過，馬教授說得沒錯。

4.我文章的副題目用了「流變」二字，目的只是在引起大家注意，五四小說也許並不純粹都是寫實的作品，可能還有其他文類在裏頭。

5.黃教授提到沈從文到底算不算得上是前衛主義的作家？我要指出，海峽兩岸不約而同地都禁沈從文的作品，臺灣國民黨禁他的作品，是基於政治的考量，因爲三〇年代的作家軍事或政治的參與精神都很強烈，沈從文也有這個傾向。另外，凌宇寫的《從邊城走向世界》，書中指出沈從文是頗具叛逆性的，他的作品有許多性愛的描寫是很黃色的，大陸禁他的作品正是基於這樣的理由。可是很奇怪的，我們臺灣讀者一提到沈從文，就覺得他溫柔敦厚，反應何以如此不同？我想也許我們應該重新去考量他的作品，其中所展現的形象不是溫柔敦厚所能涵蓋的。

〈中國文學研究的展望〉

陳慶浩先生（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本文分五部分論述：

1.少數民族文學：作者以爲談及中國文學時，不應忘記少數民族的文學，只有將漢族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合起來看，才能看到整體的中國文學及其繁花似錦的盛況。最近十多年，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大陸，較過去獲得重視，研究自1958年也已展開，尤其是1988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列進不少這一方面的詞條，首先系統化將少數民族文學看成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來論述，是一個大進步。然近年來出版研究已大不如前，展望未來，前景似乎不太樂觀。

2.民間文學：係指民間流傳之口頭文學，乃作家創作之泉源，但民間文學直到近代，受到新的文化思潮影響，知識界才開始注意民間文學。而受意識型態的影響，中國大陸從五十年代起即比較重視民間文學資料的收集和研究，可惜五十年代後期因政治運動的激烈衝擊而告停頓。八十年代上半期，推出一些大工程，如《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預定1993年出齊，成

績驕人。至於臺灣方面，近數十年來，除作者與王秋桂合作編成的《中國民間故事全集》外，幾乎停滯，而該書中臺灣卷部分遠較其他各省薄弱，可見大家並未十分重視日漸流失的臺灣文學資料。故作者希望能集合學術機關和民間學術團體、文化團體的協助，並得到政府的支持，以期順利開展搶救的工作。

3. 俗文學：以寫故事為主，作品以傳播為目的，重視娛樂之功能。中共統治大陸以後，對此實施嚴格管制，文革後才陸續開放。1983—1985年因政策改變，蓬勃發展，引起當政者及文化界之憂慮，重又政策收緊。臺港澳及其他語文區，除了對艷情文學有不同程度的管制外，其他俗文學都有充分發展的空間。然到目前為止，無論大陸或海外，仍未見有專門蒐集俗文學資料的地方，這對研究是不利的。故建立一個中國當代俗文學圖書館，組織人力從事系統研究，是中國文學研究界應負的責任。

4. 方言文學：由於歷來的中央政權，對地方勢力有戒備，甚至敵視的心理，對地方文化不單不加鼓勵，還多少加以壓制，因此，時至今日，中國方言文學的情況甚為模糊。作者就所知，簡介了吳語、粵語、閩語的文學情況，並期盼各地關心鄉土文化的人士亦能注意其本地方言文學，以利將來之研究。

最後，作者認為對少數民族文學、民間文學、俗文學和方言文學作比較充分的研究，並在這一基礎上寫出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史是從事中國文學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責任。

講 評

陳捷先先生（臺灣大學歷史系）

1. 文中「中國」一名詞的援用前後有些混淆。如談到全國人口總數根據的是新華日報1990年11月號的數字，可見指的是大陸人口，而不包括臺灣，談到少數民族時，也沒將本省山地同胞包括進去。而在民間文學一章中，講臺灣的情況，用的字眼也是「中國」。可見「中國」二字的含義不是很清楚。

2. 滿族也有一部叫《尼山薩滿傳》的文學巨著，以及古滿州的神話故事，如果都能包括進去，可能會更完整。

3. 雖然陳先生對每一類文學都有定義，可是有時候我自己反而有些無所適從，如《尼山薩滿傳》，它是清末民初的滿州人寫的作品，它是應該屬於少數民族的作

品，可是它是用滿州文寫的，又可以歸為「方言文學」，一方面它也是很通俗且在民間流傳廣久，是不是又可歸入「民間文學」？因此，歸類的問題，實在值得深思。

4. 學術研究應有標準：文中「俗文學」一節提到海外華僑特別喜歡武俠小說，作者認為既然如此，就應該予以重視，且更應包括偵探小說、言情小說等的蒐集，成立圖書館、研究機構，而不管它們是如何的低俗、不堪入目，這恐怕會流於濫收，沒有標準，不僅浪費財力，也浪費人力。

5. 陳先生多年提倡的域外漢籍之蒐集研究，本文卻反而沒有提及。

王三慶先生（文化大學中文系）

1. 所談都是以當今地理中國為範疇、為對象，對於歷代的情況，談得就偏少了些。

2. 少數民族文學一節，對於不是用漢文寫的文學作品，如藏文、回紇文、西夏文、滿文等作品的研究情況應予以補充。

3. 陳先生定義「民間文學指民間流傳的口頭文學」，我想光是從口頭上來劃分，實際上是有困難的。

4. 當今的地理中國和歷史上的地理中國是不盡相同的，因為中國的疆域隨時在變，那麼，以前在域外寫的，或現今在國外寫的作品，要不要列入呢？也是值得考慮的。

5. 在研究上，有其實際的困難存在，如一個學者除了俗務纏身外，還有其能力、趣味上的限制，如一個人所能懂的民族語言，再多也不可能全部涉及，所以理想與實際研究是有距離的。